

管际安文集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管際安先生百歲誕辰
紀念

安居昔日倡童胡先生嘗
生心安胡先生外安同孺庵西安居
其地為故盛近在咫尺博采殊識刻大

雅技輪德不孤眇望
千秋遺韻在主壇

沈曲齋習

上海

紹莉文史屬錄舊作

雨林清和陳以鴻



管际安文集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管際安先生百歲誕辰
紀念

安居普日倡童胡

先生生平
其心安明先生之朴安同弟庵山居
其地安靜處在深山僻處時有高士流連則大

雅技輪德不孤吟壁

千秋遺韻在主壇

先生之詩
沈世林書於上海

絳翁女史屬錄葛作

雨後清和陳以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际安文集 / 管际安著.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412—1651—0

I . 管… II . 管… III . 管际安（1892～1975）—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119868号

管际安文集

出版发行：贵州民族出版社
社 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 编：550001
印 刷：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毫米 1 / 32
印 张：9.75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12—1651—0
定 价：26.00元

前　　言

我们的父母离我们而去已经30年了。30年来我们的怀念不仅没有淡下来，反而越来越深。

人生在世就有一种责任：作为中国人至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更高的要求要为国争光。作为父母则要养家育家，作为职工要为本单位作出贡献。在完成责任方面，我们的父母是很出色的，他们在作为中国人、作为父母、作为职工都做得非常优秀。而一个人对他一生的责任完成得好坏，也就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决定了后人对他怀念的程度。

这本文集是管绍菊提出来搞的，得到了全体兄弟姐妹和下一代的响应。起初我们担心没有资料，因为父母很少同我们谈他们的历史，只想大家写点纪念文字，把父亲的奋斗精神流传下来。后来上网查看，才发现关于父亲的资料不算少，并且发现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上海文化名人照片中，有我们父亲的照片，这个发现，大大地鼓舞了我们。在冯庆昌、缪其浩等同志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努力，找到了一些父亲散失在各处的文章，终于决定以管际安文章为主出一本文集，而我们的文章则作为附录。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一点是：父亲在提倡国货、推广国货、中国人自己办企业等方面，从事时间最长，付出的努力最多，而网络上没有一点儿介绍，在报界政界方面都

谈到了一些。网络上资料最多的是父亲的业余爱好——昆曲方面的活动。历史是常跟人开玩笑的，往事过去了，也喜欢开这些玩笑。

父亲所做的事远不止文集中所提到的这些，而我们收集到的文章也只是他大量文章中的一小部分。据资料介绍，他在《民权报》时写了不少小说，由于《民权报》是在五四前出版的报纸，都是文言文，我们就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去搜寻。我们兄弟姐妹都已年届耄耋，为这本文集的出版确实是尽力而为了。

父亲爱国、正直、奋斗、努力的一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值得提倡、宣扬的。

在本书收集材料过程中，得到了甘纹轩、朱馥民、冯庆昌、陈以鸿、陈梦熊、赵易林、顾兆琳、袁玉冰、徐重庆、傅璧园、缪其浩等的大力帮助，特致以深深的谢意。

管绍淳

目 录

■ 时文选录

《民国日报》旧闻	(002)
旅闽杂记	(016)
时评选录	(027)
遏止新思潮	(034)
妾婢解放	(035)
改造通俗教育的第一件事	(036)
儿童公育的必要	(038)
不公道的人	(041)
印刷品哪里来的	(042)
这路是谁筑的	(046)

■ 昆曲理论

昆曲工谱四声阴阳略说	(048)
度曲歌诀	(053)
度曲杂说	(062)
顾曲识难	(073)
顾曲散记	(077)
给傅璧园先生的信	(081)
介绍昆曲的“腔”	(084)
《痴梦》的表演艺术	(091)
昆戏里的白面	(093)

■ 昆剧剧本

江南燕	(096)
春朝放怀	(100)

六神无主	(102)
陆游传	(110)
钗头凤	(118)
宦门父子	(128)
打郑屠	(162)

■ 霽庵剧谈

玉堂春之梅兰芳	(172)
李春利	(172)
盖叫天	(173)
上海票房之历史	(173)
上海游戏场之略历	(176)
霁庵剧谈	(179)
记北京福寿社	(181)
苏台梨痕录	(183)
大鼓丛谈	(185)

■ 附录

关于管际安先生

管际安生平简介	管绍沅 (192)
管际安先生家谱	管绍清 (198)
追根溯源——关于曾祖父的传说	管绍淳、管绍兰 (203)

上海昆曲界纪念管际安先生百岁诞辰

纪念管际安先生	上海昆曲研习社《曲友信息》 (205)
曲会散记	虞瑞庆 (207)

昆曲界一批同仁昨聚会纪念

管际安百岁诞辰	李葵南 (208)
陈以鸿先生诗作	陈以鸿 (209)

深深的怀念

悼念管际安老先生	赵景深 (210)
管际安	郑逸梅 (211)

绝句两首	傅璧园	(212)
蓦然回首：化作春泥更护花	张万良	(212)
清明时节话前贤	兼 中	(215)
大表哥嫂	陆钦信	(224)
表姑夫来信	娄尔品	(226)
回忆大舅	高振乾、高振荃	(227)
永远铭记父亲的教诲	管绍英	(230)
悠悠往事	管绍淳	(232)
真正的中国人	管绍元	(250)
我心中的楷模	管绍菊	(255)
怀念我的双亲	管绍兰	(276)
回忆阿爹	管祖德	(282)

时文选录

《民国日报》旧闻

管际安

诞生于全国讨袁声中

《民国日报》于1916年四五月间创办，其时正在袁世凯窃国僭帝、全国纷起讨伐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尚未回国，陈其美受命先来上海。在上海办份报纸，也是孙中山先生预定的策划之一。开办经费据闻3000元，交由叶楚伧、邵力子经营其事。为数当然甚小，先天原来不足，以后一直是个穷报馆。《民国日报》的命名，是否出于孙中山先生不能肯定。

创刊时馆址在四川南路（当时名天主堂街）南端近人民路处，是个一开间的旧式建筑。门面布置极为简陋，不过一只小账台、一只方桌、几只方凳和几条长凳而已，连柜台都没有。前年经过其地，这所旧建筑还存在。

报馆规模虽小、设备虽简，对于办报的原来要求并无多大影响。一则民党报纸在民初（1912～1913）盛极一时，二次革命失败后相继停刊，与上海人士阔别已历数年，一旦重以民党的代言机关与上海人见面，自能得到重视。二则二次革命后，民党重要人物流亡海外，策动一切。而国内的民党分子散处四方，消息间隔，缺乏联系。在上海办一份报纸，无异设立一个公开的民党通讯机构，让各地的民党分子得以闻风来归，集中力量，共图大举；这个作用也是不小的。发生这两个作用，并不一定需要规模宏大、设备完善。

交由叶楚伧、邵力子负责办理党报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从事报业的经历关系。楚伧在清朝末年即在《汕头日报》当编辑（姚雨平所办。当时来邀陈佩忍，陈因道远不就，推荐楚伧前往。光复后，楚伧还在姚雨平部队里有个参谋名义），民初在

《民立报》，二次革命后又在邵元冲所办的《太平洋报》，从事报业经历较长。力子亦《民立报》旧人。当时民初在上海办报的报人都不在上海，因此《民国日报》的负责人即归诸叶、邵二人。

关于馆址问题，经费固为原因之一。上海各报馆一向都在旧英租界，比较集中。据我记忆，只有《民权报》在将近停刊的时候，曾一度迁至法租界的洋泾浜附近。《民国日报》孤单单地开设于旧法租界南隅，则由于当时的环境关系。

袁世凯称帝，在国际方面，日本人和英国人最为起劲，法国方面态度较为观望。此其一。

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曾以搜捕党人作为答应扩充法新租界的交换条件。此时早已由上海工巡捐局会同勘界、立石，扩充租界成为事实；时过境迁，法国人也就不再买北京政府的账。当时回国的民主党重要分子如陈其美、柏文蔚等，都居住法租界，作半公开的活动。在法租界方面，只要不发生什么事故，也就不来干涉。此其二。

关于这一点，有件较为重要的事可以证明。陈其美派人在外白渡桥枪杀了上海镇守使郑海成（在外白渡桥动手，即是避免在旧法租界发生事故），袁世凯即主使张宗昌派人暗杀了陈其美。当时袁世凯还政权在握，如果搜捕党人的旧诺仍有效，尽可由外交途径向法租界要人；舍此不图，而竟出于暗杀手段，可见旧诺已成废话，早行不通了。上海报界对帝制不肯捧场，筹安会分子也无可奈何，特地到上海办个《亚细亚日报》，专门吹捧帝制，馆址设在旧英租界望平街的北端，主持人似为顾鳌，执笔者张客公（曾在《民权报》，后来投靠了袁世凯）。此报开办不久，挨了一颗炸弹，自知难以立足，就此收场。西方列强间是有矛盾的，时常会发生对立。旧英租界既有吹捧帝制的报纸，旧法租界何尝不可有反对帝制的报纸。此其三。

有此种种原因，《民国日报》所以选择在旧法租界较僻的地点作为馆址。

文人办报积习难移

浅尝几杯酒，曼吟几句诗，“风雅”自命；做人要讲温文，论事要讲蕴藉，说话要讲含蓄，遇到问题不从正面着笔做“义正词严”的表示，偏喜旁敲侧击，或者说些不痛不痒的讽刺话。旧时代文人大都如此，楚伧即为其中典型人物之一。杨千里在《民立报》编本市新闻时，曾将四段新闻的标题联成七绝一首。这种弄笔头的习气，楚伧当时赞不绝口，直到多少年后，还引作谈话资料。办报而讲究这一套，作风可见一斑。

民党对于党报当然极为重视，但交给一两个人办理以后便不大过问，党内更重要分子也不随时参加报社的工作，一切全凭这一两个人负责。民初各家民党报纸直到《民国日报》一贯如此，虽说是“专责”问题，力量终究较轻。即向来的报人，一朝离开报馆另有其他任务，好像从此改了行。宋教仁原是《民立报》的报人，笔名渔父，参加唐绍仪内阁任农林部长之后，便不再为《民立报》写作什么了。

在这种情况下，民党报纸对于党的作用也就不能发生显著的功效。

三次长期停刊的经过

《民国日报》被迫长期停刊，先后凡三次。第一次在1926年冬间，由于军阀孙传芳的压迫，至1927年春间北伐胜利复刊。第二次在一·二八前夕，被公共租界警务处封门，至当年5月间复刊。第三次在1937年冬，“八一三”事变后3个月，直到1945年抗日胜利才复刊。

孙传芳从福建打进浙江，又从浙江打进江苏，占据东南半壁，气焰不可一世。《民国日报》登载了一篇外面投稿的文章，不知谁家手笔，题目也不记得了，内容谴责孙传芳颇力。孙勃然大怒，要封报拿人。当时有人暗中通知《民国日报》，

劝告暂避凶焰。编辑部同人得此消息，四方隐避，只得暂时停刊。事隔数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送来传票，淞沪镇守使署对《民国日报》提起诉讼，定期传讯。届时《民国日报》有不少同事到案，大部分是营业部成员，其中以顾尹孚（叶楚伧的启蒙老师）年事最高，推为首列。淞沪镇守使署由法律顾问詹纪凤律师代表首先发言，声量极低，听不清说些什么，言罢随递公文一件。会审官关炯之看了公文，对詹纪凤说：“《民国日报》已经停版，不必再发封了。”詹纪凤接着提出要求，说道：“报馆虽停，今天到案的当有负责人在内，让我一起带回去追究。”陪审官英副领事立即表示同意，在案由单上写了些字，签了名移送关炯之面前。关炯之再把镇守使署公文看了一遍，向詹纪凤说：“镇守使署有什么要求，当然协助。但是来文上没有提到带人的话；如果要带人，另外备一公文，再行办理。”大概这番话出于詹纪凤意料之外，一时竟呆住了。关炯之就在案由单上划了几笔，送还英副领事，宣告退庭。

这场风波即此结束，镇守使署也没有什么继续行动。关炯之与《民国日报》素无渊源，何以出此，原因至今未明。

公共租界警务处封门的第二次停刊，据说出于工部局日籍董事的指使。那天是“一·二八”前夕，风声甚紧，在下午2时左右，突然有个三道头巡捕，带领几个便衣人走进民国日报馆，赶走楼下正在办事的成员，拉上铁门，钉上木板，贴上封条，封条上也没注明什么事由。向例，公共租界发封任何商铺，必须先经会审公廨判决，由警务处执行。这次由警务处径自发封，未经法律手续，显然是违法的。当时有人向警务处来人提出，来人气势汹汹地说：“你认为不对，到公堂控告好了。”

封门的原因何在？起因不远，就在隔年冬间。1931年冬，日本东京发生一次日皇遇刺案。日皇大正在出行时，中途被人投掷炸弹，击中随行人员的一辆汽车，伤了几个人。这段消息传到上海，《民国日报》编辑许性初加了个小标题，引用“张子房博浪椎”的故事：“不幸仅中副车”。当天晚上，编辑部

正在忙碌之际，楼梯上登登登闯来3个日本兵，个个酒气醺醺，步履歪斜。上得楼来，走到楼梯口一张桌子前面（编本市新闻的），掏出一张《民国日报》摊在桌子上，指这报纸大吵大闹。编辑部同人都不通日语，不知在说些什么。

彼此言语不通也有好处，吵闹不出花样来了，日本兵只好自己收场。收场总得装一点“虎势”，一个日本兵拔出刺刀，先在桌沿敲上几下，举起来用力在桌上一插，刺刀柄晃了几晃，然后收下刺刀，和其他两个日本兵叽叽咕咕、踉踉跄跄下楼而去。

这便是日籍董事指使警务处封门的原因。到当年5月，国民政府签订《淞沪协定》，局势苟安下来。《民国日报》要求重行出版，租界当局还是不准。不得已改名《民报》，方得复刊。

第三次停刊在“八一三”抗战以后。抗日战争自8月开始，到当年11月间，日寇深入，南京沦陷。有一天下午，工部局警务处邀几家报馆负责人谈话，《民国日报》在内，此外还有《立报》、《时事新报》等。到时各报代表到齐走进一间暗无日光的警务处总巡办公室。总巡高踞椅上，说一声“坐”。其实写字台边只有一张空椅子，根本没有来客的座位。总巡开口道：“你们是中国人，抗日是你们的事。现在南京已经沦陷，此地容你们不得，到别处去活动吧。我通知你们，从明天起一概停版。”当时各代表提出异议。总巡说：“我已通知你们，你们可以回去了。”各代表只得退出，交换了一番意见，决定停刊。

上海同业对警务处的强迫停刊都很愤慨，《申报》自动停刊，表示抗议（过了一个时期重行出版）。《申报》这一行动固然没有起什么作用，至少也是正义感的一种表示。但是，同业中有人讥笑《申报》经理马荫良，说他：“是个书生，不懂得生意经。”

《民国日报》此次停刊，停了整整8年，直到1945年11月，方始仍用《民国日报》原名继续复刊。

两次短期停刊原由

《民国日报》中途停刊，除了上述三次为期较长的以外，还有两次为期较短的；这两次都因与租界当局发生正面冲突，经会审公廨传案判决。

民元以来，上海民党报纸盛极一时；他们的立场，集中矛头专对军阀统治阶级，对于近在肘腋的租界当局避免正面冲突，有人认为他们的革命工作还需要利用租界活动，所以不欲再树近敌，影响事业。这种说法固然不能说它完全确凿，但也并不能说毫无根据。癸丑（1913）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对《中华民报》负责人邓家彦提起诉讼，指为“乱党”，要求引渡。邓家彦的辩护律师即以“被告在租界向来安分，从未犯过案件，不能指为乱党”为理由，请求予以保护。结果判处徒刑两年，并未引渡。《中华民报》亦仍照常出版，后来自动停刊，是为了经济关系，与本案无涉。这说明前说不无一点理由。袁世凯为了搜捕租界内党人，后来竟以答应法租界扩充租界为交换条件，这是癸丑以后一二年的事。

《民国日报》第一次的短期停刊，却是揭发租界当局隐私，发生正面冲突而起。事情为了一件汽车伤人案，年份大概在1920年前后。这一年的农历元旦，浙籍富商徐某之子挟妓自驾汽车兜喜神方（旧的历书上载有什么喜神、财神等或东或南的方向，好事者于元旦清晨，依照所指喜神方向出门行走，说可以碰到喜神，长年快乐），在南京路、福建路附近撞倒一个行人，当场身死。事情发生后，徐某在捕房交保出外。究竟是件命案，捕房不得不向会审公廨投诉。俗语说“天大的官司，地大的银子”，徐某花上一笔巨款，将以“死者自不小心”为理由，逍遥法外。这笔交易当然是秘密的，外人无从得知。不料徐某得意忘形，竟然自己泄露出来，甚至花钱的数目也说了。登时一传十、十传百，案子尚未开审，消息早已传遍了街

头巷尾。《民国日报》本市新闻主编者邵力子把这项消息完全揭露。

本案开审之日，邵力子也被传到案。他既非本案见证，又没有人对他起诉，被传得不明不白。并且在本案审理之前先向邵力子问话，问话的又非会审官，而是陪审的英国白副领事。白副领事诘问报载消息从何而来？是何用意？力子答复：“这项消息传遍上海，几乎尽人皆知。有闻必录，是新闻记者职责所在。至于用意，无非等待本案审判，以觇所传消息之虚实。”白副领事说：“案件未经法庭审理，先在外面传播猜测之词，足以影响审判官心理。你可知道？”力子回说：“我只知道审判官要根据事实、援照法律，不知其他。”白副领事无言可驳，恼火了，悍然宣称：“今天传你来，让你看看审判。你散布流言，罚你停刊一天。”至此方知被传原因，原来是观审的。观审而受到处分，可算奇闻。

接着方始审理本案，如何判决已记不清楚，总之被告不会无罪了，但判罪还是轻微的。

第二次短期停刊记得为期7天，不能算短了。这次的停刊，发生于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争取华董的运动中。

公共租界工部局向来只有外国籍董事，每年由纳税人会选举出来。尽管公共租界的各种捐税都出在中国人头上，在纳税人名单中竟然一个中国人都没有，更不要说董事了。在租界纳税华人会和各马路联合会努力抗争中，英国领事曾经对纳税华人代表说过：“你们争取华董，自有一定的理由。但你们要知道，租界从何而来。”这样的语气，显然把租界当作殖民地看待。

在争取华董运动中，有一年工部局增加房捐（上海人习称巡捕捐。记得以前按房租征2.5%，这次增至4%），当时各马路联合会以“工部局无华董在内，不能片面决定”为理由，一致拒不缴纳。工部局警务处派出大批探捕，分向各马路强行征收，行动粗暴，毁损货物、殴伤店员，到处皆是，尤以老闸捕房一带市区中心为甚。《民国日报》根据租界访员郑某的访

稿，记述商店被扰实情，刊登了出来。次日即由会审公廨送来传票。开审之日，警务处以“记载不实，损害名誉”提起控诉，虽经各方证明所载确实，终于被判停刊7天。

发生过经济关系的几个军阀

《民国日报》与军阀，照理该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政局变幻之际，有几个军阀曾同《民国日报》发生过经济关系。

最早的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大约在1920年左右，通过于右任的拉拢，按月由陈树藩拨给一些经费，数目不详，为期也不清楚。陈树藩不是大军阀，陕西又是穷省份，数目不会多，为期也不会很长的。

第二个发生经济关系的是张作霖，在孙、段、张结成联合阵线的时候。当时叶楚伧以孙中山秘书名义到沈阳活动，在彼处停留有一两个月时间。张作霖答应拨给《民国日报》经费，据闻按月3000元。楚伧回沪以后，《民国日报》特地出过“奉天版”。是按日出版还是定期，出过多少次，内容如何？我当时已离开报馆，全不知道。恐怕当时在馆的人也未必说得清，因为大家都是只听说而没见过。

西南地区的军人该与《民国日报》较为接近，但发生过经济关系的，据我所知，只有云南唐继尧一人，时期在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唐继尧还派一同乡沈某到《民国日报》工作。

等米下锅的日子

印报的纸，等于人家的粮食，不可一日无。经济宽裕的报馆大批选购，自备仓库存储。《民国日报》是出名的穷报馆，1920年前后这段时间最为困难，时常无隔宿之粮，过着等米下锅的日子。

黄昏已过，编辑部里有的工作已毕，有的正在操心，有的还闲着。叶楚伧一杯在手，自得其乐。门口有人探头探脑，看